

向往戴维森

王路 / 文

一直盼望着参加“戴维森与中国哲学”学术研讨会，见一见这位令人景仰的学者，想不到却听说他去世的消息。心情复杂，难以言表。

戴维森著作不多，但是他的文章和思想影响极大。关于他的思想的学术研讨会，世界上开了将近20个，关于他的思想研究的著作出了20多部，他的成名论文《真与意义》是被选编和引用的最多的文章之一。他到许多国家讲过学，他的一些文章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。一句话，戴维森不仅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，而且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之一。

戴维森最主要的工作是意义理论。他高度评价弗雷格的思想，认为正是由于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所指的区分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探讨意义问题。但是他又深刻地指出，局限于意义和所指的讨论将使我们重新回到经验的老路上，甚至走进死胡同。因此他另辟新径，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出发，探讨一种不依赖于经验的绝对的意义理论，也叫真之理论。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。几十年来，他反复探讨这一问题。如果仅从他发表论文的内容看，他的论述有不少重复，一些论述不乏相互矛盾之处。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从事哲学研究的科学态度，而且他的工作不仅在不断深入，还启发带动了一大批哲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，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。

我从戴维森的思想受益主要有两点。除了意义理论本身以外，还有就是逻辑与哲学的关系。他专门论述这二者关系的地方很少，但是在他的文章中，几乎无处不在体现着这二者的关系，尤其是他的论文《真与意义》和《形而上学中的真之方法》。不少人认为分析哲学颠覆了形而上学，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。戴维森(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)的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，过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都是形而上学的研究，同样，分析哲学的研究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。分析哲学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方法。哲学史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。方法的变革则带来哲学思想的进步。是与真的联系从古至今，一脉相承。真的核心地位从隐蔽到凸显，反映了哲学方式的变化。像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，始终是站在哲学史研究的主线上，思考着哲学的核心问题。因此，他才是重要的哲学家，他才能被称为“对人们有帮助的哲学史的解释者”，他的影响才会是重大而深远的。

戴维森除了研究工作，一生都在教书。他认为，在教学工作中你会发现，一个安静的小伙子在讨论班上一言不发，却会写出一篇出色的论文，而一个女孩子坐在角落里，穿着超短裙，显得有些轻巧，却可能是大课上最有才能的学生。这是教学对你的一种报偿。这些惊奇使我们时常想到，我们可能很容易低估我们的学生，甚至一些学生根本用不着让我们教他们如何研究哲学，因为一些我们费心尽力的事情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

了。这些教学体会不仅有趣，而且给人以启示。也许是因为我刚刚开始教学，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不过，哲学确实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些性质，需要认真体会。做哲学教师，面对学生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。

戴维森访问过许多国家，与许多国家的哲学家有广泛的接触。他认为，过去有许多事情他不知道，而且今后还有许多事情他不知道。他想知道其他经济、文化、地理环境下的哲学家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。他想和他们进行争论，依赖他们的批评和洞见，反过来再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。这话说得不错。好奇心是天性，绝不哲学家所独有。但是，争论、批评和洞见却是哲学所必须要有的活动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争论和批评太少，声称洞见和发现的却大有人在。我相信，戴维森的话绝不是假谦虚，而是一种对哲学和对从事哲学活动的见解。这种见解出于他几十年哲学研究的心得，对我们是极其有价值的。

戴维森是我信赖的哲学家，十年前我曾经想编一本专门论述真的文集，所选目录得到他的回信肯定。他又是我推崇的哲学家，我曾多次建议商务印书馆重印戴维森的中译本文集，我也建议我的一些朋友重视和研究戴维森，自己还翻译过他在90年代初期的三个讲座：《真之结构和内容》，发表在《哲学译丛》上。戴维森也是我喜欢的哲学家，他的研究不是东一榔头，西一棒子，而是专注于最基本的问题上，锲而不舍。神交已久，自然特别希望能够见一见他，与他当面谈一谈自己的想法，特别是谈一谈自己关于是与真的一些想法。没有可能的事情，人们大概也不会去梦想。如今我真是有些遗憾，一种无可补救的遗憾。(责任编辑：鲁旭东)

[回主页](#)